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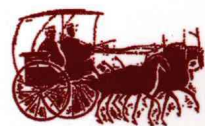
「论语」

LUNYU

TONGSHI JIEDU YU DIANPING

通释、
解读与点评

陈广达 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论语》

通释、解读与点评

陈广逵 编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对《论语》所做的研究,是一本弘扬传统文化,推广国学的书。全书风格统一,角度新颖。每篇均有五个小栏目统领全文,包括:(1)导语。每篇篇首均有一条导语,介绍全篇的主要内容、重要思想以及著名的文句。(2)原文。每章《论语》原文前均标有篇与章的序数,并在每页的右边标示原文所在的篇目。(3)原文通释。对该章《论语》进行整体解释,力求忠实原文,使原文的每个字都有着落。(4)注释。说明每个字的意义、用法,介绍人物、事件及语言背景。(5)解读与点评。对该章《论语》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介绍,既与“注释”相关联,又有细微区别。

责任编辑:张尚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通释、解读与点评/陈广逵编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247-736-0

I. 论… II. 陈…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1063号

《论语》通释、解读与点评

陈广逵 编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9

责编邮箱: xuemo7411@sina.com

印 刷:北京汉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34.75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820千字

定 价:55.00元

ISBN 978-7-80247-736-0/B·01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一、编纂本书的缘由

实在没有想到我会走进《论语》研究队伍,更没有想到会将自己研究的成果集结出版。

20多年前,在“左”的思想教育下,我对孔子本没有好印象:学习现代史,开篇的内容就是“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提倡的反封建,就有“砸烂孔家店”的口号;“批林批孔”更是将孔子搞臭了。在我的印象里孔子坏得不得了:他顽固地“克己复礼”,维护封建礼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给高中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时,我还认定,孔子是封建制度“吃人”历史的罪魁祸首;他鄙视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鼓吹“学而优则仕”^①;他轻视妇女,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②;他缺少人性,说“老而不死是为贼”^③;他鼓吹愚民政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④;他唯利是图,向他送十条干肉才肯收学生^⑤;他鼓吹“三纲五常”,鼓励臣民“愚忠”^⑥。——凡此种种,在我学习的年代,所接受的文化和思想教育中就有这些。“文革”后,虽然有过思想解放的拨乱反正,但轮到为孔子正名就比较晚了,我接受高等教育时,孔子还没有彻底“翻身”,所以我依然未改变对孔子的坏看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对学生进行忠孝教育时我逐渐认识到《论语》中主张的孝道是很有用的。直到有机会比较多地接触《论语》之后,才觉得孔子说的话很有道理,才知道自己过去对孔子的认识错了。直接触发我研究《论语》的原因还是初中课本中选录了《论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最初选入了“《论语》六则”,是时,我已经不任课了,但时而代课并仍关注课本。我认为课本的多个注释说不通,比如对“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第2章)中的“何有于我哉”的解释。课本注释的是:“哪一样我能有呢?这是孔子自谦的话。”我觉得这个解释既不符合原意,又有悖于孔子的一贯说法,所以当时我就不认同,但反馈渠道不畅,相当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后来有机会上了“人教网”,我在论坛里发了帖子,谈对所选《论语》解释的看法,使课本及时修正了一些问题。

《论语》进入中学课本实在是好事,“国学”开始热起来,我也开始关注《论语》。一次在书店看到了一本装帧很美的《论语》,我就买了回来,这是我买的第一本《论语》。当时我在读原文和译文以及解析时,发现这本装帧很美的《论语》,文字粗糙,错误率极高,实在不能认同,于是我又买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在读各本《论语》过程中,我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多了起来,对论语的理解加深了,但对众家的解释多有看法,特别是对一些为了迎合市场没有明确署名,甚至标注为“孔子著”的,在错误理解《论语》基础上大发议论的书很有看法,于是便产生了要自己解释《论语》的念头。我曾经辅导过



一些学生,他们便成了我通释《论语》的第一批受众,我一边逐篇逐章地编辑解释原文,一边给他们讲授,在讲授中不断完善。

学习就是为了丰富自己,学习就是为了应用。《论语》与生活联系太紧密了,特别有实用价值。在极左思想禁锢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养成了出言谨慎的习惯,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今天,即使不会再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过头的话我也不会再说。像《论语》这样一部说教内容相当丰富的书,在对它“解读”与“点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联系世人生活实际,避开现实不可能,过分遮掩不足取。所以在点评中,我联系了一些从古到今的实例。当代的实例不多,但现象有所列举,而且这些现象大致是古今中外司空见惯之事,绝不会有影射攻击的恶意。

在《论语》研究方面,同自幼就读《论语》,现在已有研究成就的人比较,我是“后学”;同专门研究《论语》的人比较,我是“外行”;同谈论《论语》头头是道“有闻”的大师比较,我是“无闻”与“无名”之辈。而且我既不是名牌大学专职教授,又非名牌大学毕业生,更不是硕士博士,虽然是大学学历,但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编纂《〈论语〉通释、解读与点评》是因为看到各版本译注解多有不妥之处,为了兴国学而产生的义气,也是为了给孔子正名,来说服像过去的我一样看待孔子和《论语》的人。兴之所致,耗费些时日,居然编纂成一集。

在研究通释《论语》过程中,必然要查询史料和他人对《论语》的诠释,也觉得有必要把相关的一些内容整理在一起,于是又产生了把《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通释一遍的念头,就这样,在对《论语》进行通释、解读和点评的后面附录了我分别对《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全文通释。

二、关于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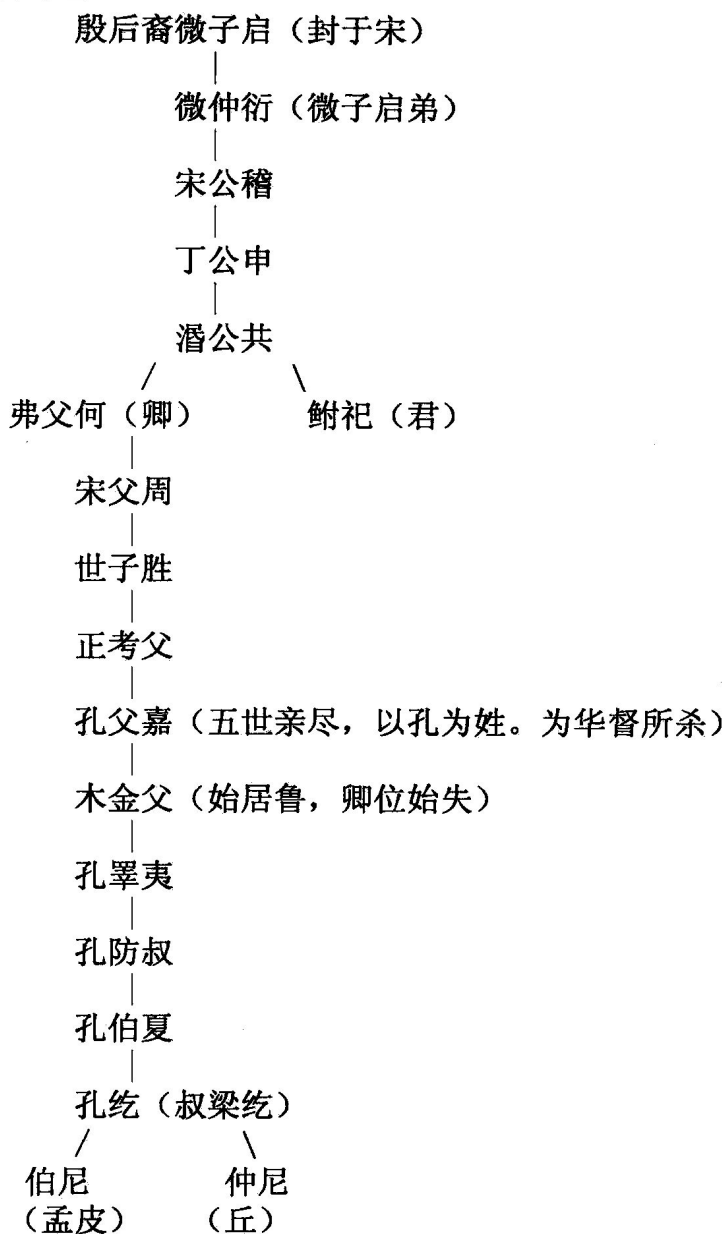
(一)身世与经历

孔子,名丘,字仲尼。按《史记》的说法,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的陬邑;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卒于鲁国阙里。

孔子是殷商王族的后裔。周朝灭纣和平定纣王儿子武庚的叛乱之后,封殷商贤人纣王同母兄微子启做宋国国君。微子启传位给弟弟微仲衍。宋国第五代国君宋襄公的长子弗父何,把继承权让给弟弟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成了一般贵族,他就是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经由宋父周传至世子胜,又传至正考父,五传至孔父嘉(名嘉,字孔父)。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世亲尽,别为公侯”,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孔氏后代避难奔鲁,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所以也称叔梁纥)曾任陬邑的长官,勇武有力,一次作战中曾用手举起闸门,救出误冲入敌城的战士(《左传·襄公十年》)。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了9个女儿,其妾生了一个残疾儿子孟皮。叔梁纥64岁时娶了19岁的颜徵在。颜氏怀孕前,曾前往曲阜东南的尼丘向神明祈祷,孔子初生时头顶凹下如丘,所以父母就给儿子取名为“丘”,从孟皮而论,因孔子排行老二,且“祷于尼丘之山”,所以取字为“仲尼”。



附表：孔子家世



孔子3岁左右，叔梁纥因病逝世，母亲颜氏带着孔子从陬邑迁居到曲阜的阙里。孔子虽为殷王族后裔，但家道早已衰落，父亲逝世后家境相当贫苦。

孔子接受教育的过程，尤其是早期接受启蒙教育的过程一直都是难以说清的谜。孔子生活的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是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因他辅佐成王有功，成王给鲁国一个最高的礼遇——诸侯享用天子的礼节。因此鲁国在周代的礼仪文化遗产方面比其他诸侯国要丰富得多，这个环境对孔子的成长有积极影响。孔子自幼敏而好学，童年时玩游戏，就常摆各种祭器，效仿大人们祭祀的礼仪，这为他礼乐观念的形成



做了良好的铺垫。孔子 11 岁时曾跟鲁大师学习周礼,15 岁时,开始有了明确的学习目的,一直努力学习古代文献,属“自学成才”。他的丰富思想学说主要受周礼影响,广泛的学习内容除来自文献史料外,还来自勤学好问,来自社会生活实践。正如他自道的那样“非而生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到 20 岁时,孔子已经掌握了很多文化知识,涉猎相当广泛。博闻强记,多才多艺,有“博学好礼”的美誉。他担任过给人帮办婚丧祭祀的“相礼”、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牧场牛羊的“乘田”。

孔子的身份是“士”,古时的“士”在成人时要举行加冠礼,娶妻生子都要在加冠之后,一般在 20 岁时进行,因家庭变故可能提前。孔子的加冠礼应该在 20 岁前,因为他 19 岁就娶宋人丁官(Jīguān)氏为妻,20 岁生子鲤时,得到昭公赐的鲤鱼——“士”一级以上的人才有的待遇。成人时的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古代尺短,一尺为现在的六寸九分),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

孔子出生在鲁襄公时代,经历了昭公、定公,至哀公十六年。这个时代,社会正处在激烈变革的时期。周王朝中央政权早已名存实亡,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制度也被破坏殆尽,齐、晋等强大诸侯国曾先后成为霸主,左右政局,发号施令,接受本应周天子才可以拥有的朝贺和贡赋。各诸侯国权势也在下移,权柄掌握在卿大夫手中,如当时的霸主晋国的权柄为六卿掌握,齐国的权柄为田氏掌握,而鲁国权柄为三桓掌握。诸侯卿大夫的权力也在丧失,为他们的家臣所控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最典型的是鲁国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曾一度专断鲁国政治。

孔子崇尚周代的礼仪文化制度,大约在他 23 岁左右开始招收弟子,他一边刻苦自学,努力钻研,不断充实自己,一边私人讲学。大致在孔子 24 岁时,他的母亲颜氏去世。

孔子 35 岁时,鲁昭公被三桓驱逐逃到了齐国,鲁国一度没有国君,孔子得不到任用,也到了齐国,做了贵族高昭子的家臣。经高推荐,齐景公曾向孔子咨询过治国的道理,很欣赏孔子。但齐国有大夫排挤孔子,他便离齐返鲁。当时的鲁国,贵族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政治混乱,孔子没有出仕的机会,便居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他刻苦钻研《周易》竟“韦编三绝”;同时,他继续私人讲学。

阳虎失败出奔后,51 岁的孔子才被任用,先是出任中都宰,又升任司空,继而成为司寇并摄相事,参与国家大事。他施展抱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齐鲁“夹谷盟会”争国权,二是堕“三都”振兴公室。鲁定公十年(公元前 500 年),齐景公与鲁定公在夹谷相会,孔子以“相”的身份参与仪式的主持。在定盟过程中,孔子申明礼法,挫败了齐国的侮辱和威胁,保全了鲁国的尊严。“三都”是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的封邑,是三桓势力的根据地,它的存在,威胁鲁国中央政权;“三都”又掌握在各自陪臣手中,也威胁着三桓本身的利益。孔子争取叔孙氏的同意,先堕了郕邑;又打败了季氏家臣公山不狃的反叛,成功堕费邑。成邑因在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坚守下,鲁兵无力攻克,使“堕三都”计划未能圆满。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孔子虽然参预治理国政只 3 个月,就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齐国担心孔子主政鲁国强盛了会对齐国构成威胁,便设法加以破坏。于是给鲁君臣送来女乐 80 人,良马 120 匹,华车 30 辆。鲁国国君和执政者接受了齐国的馈



赠,沉溺于女乐,一连3天不上朝问政。孔子大失所望,离开鲁国,开始他的“周游列国”之行。

孔子先后周游过卫、曹、宋、陈、蔡、楚等国,其间数度被困:在宋国受到匡人的围攻,受到宋国司马的威胁;在陈、蔡两国边境的郊野,断粮几天,一行人疲惫不堪。孔子周游14年而终不见用,于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68岁时返回鲁国。

回国后,孔子继续从事教学,并继续完善《诗》、《书》、《礼》、《乐》的整理,因鲁史而作《春秋》。

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时,大病7天而卒,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旁。

(二) 人生价值

1. 孔子是承前启后的学者。

孔子的学术成就,是从钻研古代文化遗产开始的。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第1章),强调继承,反对凭空编造。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第28章)。

孔子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孔子不相信占卜,把《易》学由卜筮引向哲理。他引用《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没有恒心的害处,并认为这样的人还是“不占而已矣”(《子路》第22章),辩证而理性地运用卦爻辞。儒家从哲理角度解释《周易》的“十翼”,源于孔子的思想。它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辞》)它解释阴阳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五经中有两部是历史书,一是上古文献汇编《尚书》,一是孔子所在时代的《春秋》。孔子对《尚书》进行了整理,又依据鲁国史书编纂了《春秋》,把历史作为资政工具,并为教学提供教材,为当政者提供参考。《春秋》可以说是孔子心血的结晶之作,他一直在整理完善补充,直到逝世前还在研究。他按周礼和仁的标准,赞扬和肯定符合礼的人物言行,批评贬损违背礼和仁的人物事件,给当代人和后人树立了效法的榜样和警示的范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实际上,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过程中揉进了自己的心血,也揉进了自己的思想,他把“中庸”、“仁政”、“礼”、“忠恕”、“正名分”等政治伦理思想,寄托在史书之中,运用史书来宣扬政治主张。

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是他为这个宝贵文化遗产至今能够存世做出的巨大贡献。《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各类诗歌的总集。孔子删繁就简,对它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并将其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第2章)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8章)他重视《诗经》的知识功能和晓喻教化作用,让弟子把它作为从政做人的借鉴资料。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子路》第5章)作为学者的孔子其贡献主要从整理著述史料、私人讲学、向统治者和世人宣传政治伦理思想三方面体现出来。

2. 孔子是伟大的史学家。

正是基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孔子精心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涉及到《诗》、《书》、《礼》、《乐》、《易》等文化典籍——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资料之一就有《古文尚书》,使得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史记·孔子世家》）凡242年的历史资料，仰赖于孔子悉心考据和整理。今天我们研究春秋历史乃至更早一些的历史，都可以从孔子所述的《春秋》中找到线索。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焚书”和项羽的火烧成阳，经过孔子整理而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应该会更丰富。

“文、行、忠、信”（《述而》第25章）是孔子的主要教学内容，其中的“文”就是历史文献。孔子一方面整理历史文献，一方面又在积极传播历史文化。

人们在概括孔子功绩时，对他的称道主要集中在教育上和思想上，而忽略了他作为史学家对后世的卓越贡献。作为史学家，孔子的贡献不亚于后世的一些著名史官，甚至可以与司马迁相媲美。试想，司马迁是国家专职史官，有相应的资料来源渠道，而且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获取一些想得到的资料，孔子没有“行政”上的支持，所有资料全靠“个人行为”收集，包括他删重就简整理《诗经》，也要从四面八方的不同角度找来。

在整理研究中，孔子也在不断地丰富自己，成就了广博的学识，《史记·孔子世家》记录的孔子就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关于“坎羊”的考辨，对吴国使者关于“骨节专车”的解释，对“有隼集于陈廷而死”，关于“楷矢”的推测，对“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所获之麟的辨识，都显示出了他丰富的历史学识。

3.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其实，在孔子之前就有“教育”，但人们谈起教育自然会把孔子当作教育的祖师。其原因之一是他是第一个把教育普及到平民社会的人。孔子以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到正规的教育，教师是国家任命的一种官吏。《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一种叫“保氏”的官吏，职责之一是教育贵族子弟，教育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贵族教育不受重视。于是，孔子毅然承担起教育家的职责，首开私人讲学授徒之风。他的弟子很多，数十年间，受其教诲者约3 000人，其中学业有成的达70多人。早年招收的弟子，有的年龄跟孔子接近，如秦商只比孔子小4岁，子路只比孔子小9岁。晚年招收的弟子，有的是孙辈、重孙辈，像曾参是孔子弟子曾皙的儿子，比孔子小46岁，公孙子石竟比孔子小53岁。弟子中颇有一些突出的人物，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德行突出著称，宰我、子贡以善于辞令著称，冉有、子路以从事政治著称，子游、子夏、曾参则精通文献，成为孔子学说的重要传人。

孔子说：“有教无类。”（《卫灵公》第39章）“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第7章）孔子的教育对象异常广泛，只要严格要求自己而不断上进的人，他都谆谆教育。孔子的弟子主要是平民，但也有贵族，如南宫敬叔，是孟僖子的儿子。有的人家境比较富裕，如公良孺，“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周游列国。有的人则穷得很，如颜渊，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每天吃竹筐中的粗粮，渴了就喝清水，死了没有钱办丧事——对这样的弟子，孔子从不轻视，而且特别推崇他的好学与道德，把他看做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公冶长虽被关进监牢之中，但孔子认为不是由于他自己的罪过，因而不但不轻视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6章）他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六艺”中的“礼”属于德育，“乐”属于美育，“射”属于体育，“御”属于实践技术，“书（历史和文学）”、“数



(数学)”属于智育。孔子重视实践,特别强调道德实践,就连周游列国之时,他还与弟子们在树下演习周礼——我们今天提倡的“素质教育”不外乎如此。

孔子教学经验丰富。

第一,他善于调动弟子的积极性。《论语·先进》第24章记述他与4个弟子在一起谈话的过程,他启发弟子各自陈述志向,仔细倾听,充满平等和乐的气氛。他把培养弟子的兴趣和志向摆在重要位置,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第20章)

第二,他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他善于调动人的智慧,因势利导。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第8章)这就是从不同角度引导发问者自己思考。他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8章)

第三,他善于因材施教。当有国君、官员或弟子向孔子“问政”、“问仁”、“问智”、“问勇”等时,孔子对不同的人回答是不一样的。《论语·先进》第20章记载了一个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第四,他强调对知识的复习巩固。孔子提出“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第11章)《论语》开篇之章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习方法我们至今还在沿用。

做为教育家的孔子,他用自己的言行展现了教育者的风范,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第2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第9章)“这种敬业精神,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使他成为‘万世师表’”。

4.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

孔子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应该与他早期启蒙教育有关,与他生活的鲁国是周礼传国的环境有关,更多的则与他研究整理的古代文化内容有关。他在整理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思想学说逐步形成,从而创立了儒学并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的学术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中庸”、“仁”、“礼”、“正名分”等政治伦理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和学说,他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和传播,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永载于世界文明史册之中。

孔子强调的“礼”实则是“周礼”,是周代社会行为规范的总称,它是周公旦借鉴前代礼仪传统而制订的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护周朝统治制度的礼法。孔子推崇周礼,崇拜周公。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第14章)孔子用周礼教育弟子和引导教化百姓,也在遵循周礼、宣扬周礼过程中扩大了周礼的内涵,形成了儒家的思想学说:核心是“仁”,形式是“礼”。

孔子所宣扬的“仁”就是“博爱”,就是“以人为本”。从小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也是孔子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他把“仁”放在“礼”之上,“礼”是为“仁”服务的,反对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第3章)“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第13章)“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



乎哉!”(《阳货》第9章)“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第4章)“仁”体现在为政方面就是统治者要以仁义之心待民,要勤政、节用、有信,要爱护百姓、安抚百姓,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第1章)他还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雍也》第30章)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颜渊》第19章)孔子反对不经过教化就让民做事,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第30章)孔子主张的“仁”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表现了对人的尊重,这正是孔子和儒学的伟大之处。

孔子推崇中庸之道,他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第29章),有子也传达了孔子的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第12章)“中”有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有平常、常道等含义。孔子把它看作最高的处世标准,作为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孔子主张的中庸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仁”与“礼”的规范前提下的中庸,即“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第12章)孔子对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疾之如仇,他认为“乡原,德之贼也”(《阳货》第11章)。“仁”和中庸之道在个人修养方面主要体现在“忠恕”上。“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待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统率着忠、恕、孝、悌、宽、恭、信、敏、智、勇、刚、毅等诸多道德规范。

在方法论上孔子主张实事求是,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为政》第18章)做到了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保守固执,不唯我独尊。(《子罕》第4章)他“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第21章),对世俗迷信的鬼神,他有自己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第22章)。

做为思想家的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主张似乎离现实不远,又似乎很远。为了实现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穷毕生精力整理研究、奔走游说、亲自实践,虽四处碰壁,仍不屈不挠。

孔子是个人文主义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思想中。他反对暴政,主张德治、礼治、仁政,不赞同但又不完全反对法治。做为人文主义者,他主张对民众的教化,这一点我在文章中做了专门的论述(见《泰伯》第9章拙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合理句读》)。

做为人文主义者,孔子反对愚忠,不主张犯颜直谏,更不主张愚忠而死,所以他称道“不为纠死”的管仲(《宪问》第16、17章)。他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主张为官者“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他自己本身也是轻易不结怨的人,既坚持原则又颇识时务。后代儒者曲解了孔子的思想,劝导臣子犯颜直谏,坑害了许多忠臣。孔子自身就是个很“人文”的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第17章)

孔子是一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人:他不信鬼神却信天命。他十分想得到任用,甚至想凭借他人引见接近为政者,来达到出仕的目的,但他又不得不弃官出走;阳货请他做官,他躲避了,却又想应公山弗扰和佛肸之召(《阳货》第4、6章)。他自己也知道“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但他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报答父母(《阳货》第21章)。在孔子思想中,周礼是根本不可动摇的,“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第7章)他为一些事物的变化哀鸣,“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第



25章)但他又认同“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第3章)他反对使用武力,但他又建议国君出兵讨伐齐国“弑简公”的陈成子(《宪问》第21章),他是一个典型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

做为圣人的孔子有高人一筹之处,又没有完全脱俗。通俗一点说,孔子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积极进取的有思想的人。孔子不是神,也不是妖,他待人处事“无可无不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是个品行正直而又不固执、不任性的好人。用曾子的话来说:“夫子见人之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说苑·杂言》)读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的一段评述引起了我的共鸣:“……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三、关于《论语》

《论语》是由孔子弟子记载、保存、提供并初步整理的,由再传弟子添加的,记录孔子与部分弟子言行及个别学习内容的“片段”式散文集。

“论”字有两个读音,lún和lùn。表示伦次、编排的意义时读lún。可以肯定,《论语》是孔子逝世后才编写的,编定可能在战国初已完成,最后成书至少是曾子逝世后。定州出土的汉简本《论语》证明,约在公元前55年《论语》一书已完全定型。还可以肯定参与《论语》编定工作的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其中应该有曾参的弟子、有若的弟子。孔氏传人、师承曾子的子思,连《中庸》都著了,《论语》的相关资料的保存、提供少不了他;《论语》的最后编定,至少他参与了,孔子住宅墙中发现《古文论语》可以间接说明这个问题。

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时代《论语》有三种版本。一是《鲁论语》,20篇;二是《齐论语》,共22篇,它基本上跟《鲁论语》相同,但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三是《古文论语》,它是从孔子住宅墙中发现的,它跟传世的《鲁论语》相似,只是有两篇《子张》,实际是发现者把《尧曰》误分为两篇,原因是《尧曰》篇,只有三章,发现者误把第二章首“子张”作为篇首,因而叫做《子张》篇,并与第十九篇《子张》重名。

西汉末年,《鲁论语》的传习者张禹,担任汉成帝的教师,被封为安昌侯。他把《鲁论语》和《齐论语》合成一个版本,删掉了《问王》、《知道》两个篇目,这个版本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古文论语》,作了注解。三国时代,何晏(?~249年),为《论语集解》作疏,后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研究《论语》的著作很多,在古代最有影响的版本有三种:《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论语集注》(南宋朱熹),《论语正义》(清代刘宝楠)。当代影响较大的注本是杨伯峻的《论语释注》。《论语注疏》和《论语集注》是我搜集到的对《论语》的注疏,所以我在“解读与点评”中多有引述,但对其中相当一部分注释不完全认同。

《论语》各篇篇名不是中心内容的概括,仅是取开头的两个字或三个字作为篇名,以便称呼而已。如第一篇开头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故名《学而》篇;第十五篇开头一句话是“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故名《卫灵公》。篇下分章,章往往是一个语段。如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的章短,只有一句话;有的章比较长,已发展为一篇文章,如《先进》第24章。朱



熹《论语集注》把全书分499章(其中他把《乡党》篇分为18章)。为便于通释,我在通释《论语》时把《乡党》篇分成了25章,对《论语集注》的其他篇,后人也没有完全认同,有小的调整,我编辑出了510章,在此予以说明。

《论语》每章的内容都是独立的,章与章之间不一定有联系。每篇由若干章构成,不一定有明确的中心,仅仅是编在一起而已。个别人认为,《论语》篇章编排是“匠心独运”,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重复出现的内容看,《论语》编辑得很马虎,是大致归类的产物。把《论语》的整理者看成神仙一类的人,把不是一朝一夕的语录片断连起来解读过于牵强。但是,《论语》有的篇大致有所侧重。朱熹《论语集注》就指出:《学而》“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八佾》“皆论礼乐之事”;《公冶长》“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盖格物穷理之一端也”;《述而》“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先进》“多评弟子贤否”;《子张》“皆记弟子之言,而子夏为多,子贡次之”。

《论语》中的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齐景公、鲁哀公等等本身不是名,都是尊称,是“谥号”。记录时这些人还都在世,应该是记的姓氏或官位,弟子们当时记载不可能书之为季康子、孟懿子、孟武伯、齐景公、鲁哀公等,当再传弟子们整理时这些人人都已经做古了,所以才以礼用上谥号。

《论语》全书仅11000多字,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承载了孔子大部分思想学说。在先秦时期,它作为一个显要学派的创始人的言行录,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也在焚禁之列。汉以后,儒学及其典籍获得统治者的青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论语》列入学官,被视为“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赵岐《孟子题辞》);元延佑年间,以《四书》开科取士,《论语》文句成为“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康有为《论语注》),成为悬诸日月而不刊的金科玉律。

《论语》早在汉代就已取得了超乎众学的地位,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认真研读《论语》后,我对孔子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正如前面所述,孔子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师长,是一个理想的热烈追求者;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困难面前不退缩;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深刻的生命智慧,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当然,《论语》也有一些思想给后世带来消极影响,如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严格的等级、秩序观念,人治观等;特别是后人有意无意的曲解,使孔子背负一身罪状。

如前所述,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凡59章109次使用了“仁”字。什么是“仁”,《论语》中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已经从孔子的谈论中概括出来了。孔子强调“礼”,《论语》中凡42章75次使用了“礼”字。可以说,除了孔子弟子的个别语言可能有偏差外,《论语》基本传达了孔子的道德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等等。孔子读史集《春秋》,整理《诗经》、《周易》等,又直接面对弟子执教,可以肯定《论语》中所有言论都是有针对性的。

《论语》是片段言行录,其中“言”的比重大,有的是直接以“子曰”或“孔子曰”的形式出现,有的是以回答弟子或他人之间的形式出现,有的是在叙述孔子与弟子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记录孔子及弟子“行”的内容除《乡党》篇比较集中外,在一些篇中零星出现,散见于各篇的“行”也多与“言”揉合在一起。“《论语》二十篇,唯乡党篇无‘子曰’;



《周易》六四卦独‘乾坤’卦有‘文言’”这副对联说的是对的。

《论语》的语言简练、晓畅,善于利用语言叙事状物、传情达理,许多话充满人生精义,内涵丰富,我们经常运用的不少成语格言就出自《论语》,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欲速则不达”、“小不忍则乱大谋”、“道不同不相为谋”、“言必信,行必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为人们频繁引用,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论语》记事虽然不多,但往往有着很强的现场感,寥寥数语,人物情态如见。如《先进》第24章对4弟子侍坐的描述,《阳货》第3章对“子之武城”的记录,《卫灵公》第2章对“子路愠见”的记录。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论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四、我的古文通释思想

古今语言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的形成原因有口语与书面语相对脱节的原因,也有地域差异和时间断代过于久远的因素。要想合理解释古人的书面语,必须把握古人的书面语言习惯,掌握一定的古汉语语法知识。

解释古文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我对使用“译”字不大认同。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可以用“译”字;古代语言虽然与现代语言有差别,但都是汉语言,不存在两种语言的对译,只存在通俗的解释,用今天的语言代替古代的语言还是用“释”字比较妥帖,于是我在本书选用了“通释”的字眼。

用今天人的语言,通释古代人的语言,我更主张“直释”,在“直释”基础上可以适当“意释”。

“信”、“达”、“雅”,首先是“信”。“信”就是忠实原文,忠实原意,忠实历史的真实,不过多地增加个人理解的内容。其次是“达”。所谓“达”就是解释得“通畅”,既要把原文每个字都准确表达出来,又要按古今语言对释的规律让它通顺了。再次是“雅”,所谓“雅”就是“有文采”。同一个字对应的解释很多,选择最恰当的解释不但做到了“达”还做到了“雅”;但这还不够,比如《诗经》在原来的语言中是押韵的,解释出来后,把韵律给搞没了就不好。所以一定要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恰如其分地再现古人语言的风貌,甚至连语调语气最好也能体现出来。“雅”是在“信”与“达”基础上的加工,不能走得太远。我通释《论语》,力求做到“信”、“达”、“雅”,尽量不增加多余的字,也不减少原本有的字甚至一个虚词,基本做到了字字都有着落。为此,对可能理解困难和个别有争议的字我在注释中不厌其烦地标注,力求使读者在单独读某一章时,不必再到前面找答案。我通释的《论语》是就目前我所看到的通释本中,对原文抠得最细、注释最详尽、解释最具有特色的本子。且解读点评内容比较丰富,对理解《论语》原文,对理解孔子其人多有帮助,对各章论语的意义与问题都有分析,特别是对一些问题的订正,还《论语》语言以本来意义,还孔子以清白。

1984年,我在教高中语文时,通过对课本文言文实词的注释,参悟出了一套“倒溯



法”解释文言字词方法，特别是文言实词的思想方法。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今天语言中双音合成词居多，这些合成词的形成与古人的单音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选择今天使用的恰当的双音词来直接替代古代的单音词，或者通过用组合后的双音词的另一个语素再一次或多次地重新组合的解释方法解释古文中的单音词是很奏效的。通过查古汉语词典验证，这种方法的准确率极高。特举例如下：

(一) 直接找恰当的双音词替代古汉语单音词。

学而时习之：学—学习；习—温习，复习。

选进于礼乐，野人也：野—在野。

过犹不及：过—过头，过分。

从我于陈蔡者：从—跟从。

吾不徒行：徒—徒步。

节用而着人：节—节约。

其为人也孝弟而妇犯上者：犯—冒犯。

君子务本：本—根本。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交—结交(交往)。

允执其中：允—公允。

言中伦，行中虑：行—行动。

行其义也：行—履行。

道之不行：行—实行。

(二) 用组合成的双音词的另一个语素解释当前单音词。

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方—方正—正。

灵公太子蒍聩得过南子：过—罪过—罪。

言中伦，行中虑：虑—思虑—思。

至，则行焉：行—行走—走。

(三) 为古代单音词组合双音词，用双音词的另一个语素再组双音词来解释(有时需要多轮组合)。

门人不敬子路：①敬—尊敬—尊—尊重。②敬—敬重—重—尊重。

贤贤，易色：易—轻易—轻—轻视。

羿荡舟：①荡—动荡—动—推动—推。②荡—动荡—动—行动—行。

有耻且格：格—规格—规—规矩。

简在帝心：简—简明—明—明察。

四方之政行焉：行—通行—通—畅通。

言中伦，行中虑：伦—伦理—理—条理(道理)。

信则民任焉：任—信任—信—信赖。

服周之冕：服—佩服—佩—佩戴—戴。



(四)为古代单音词组合双音词(有时是两轮以上组合),对双音词的另一个语素再引申解释。

礼之用和为贵:用—使用—实行。

不以礼节之:节—节制—约束。

用之则行:行—履行—行动—去做。

子张问“行”:行—通行—通—行得通。

贫而无谄:谄—谄媚—巴结。

人不间于父母兄弟之言:间—间隙—挑剔。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复—回复—做出回复—实现—兑现。

在上面所举例中,我有意将把对“行”的不同解释拿出来,意在说明遇到多义词时要选择恰当的解释,一个“行”仅简单列举的义项就有“行动”、“履行”、“实行”、“通”、“通行”、“畅通”、“去做”的解释。如果能掌握丰富的词汇,又能迅速反应,在没有古汉语字典的情况下,也可以大致解读一些文言文。

在这里我还要谈谈古今字与通假字的区别。

什么叫古今字呢?汉字造字有一个漫长和约定俗成的过程,起初的汉字比较少,一个字要担负很多“职能”,比如“共”,既要负责“共同”义的职责,又要兼负“拱”、“恭”、“供”等义的职责。比如“主”既要担负“主要”的职责,又要兼负“注”、“住”等义的职责。后来人们为了使用和区分方便才又造了一些字来分担职责。比如造了“拱”、“恭”、“供”字,来分担“共”字的职责,造了“注”和“住”字来分担“主”的职责。在“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共”就是古字,我们诠释时,用了“拱”字,“拱”就是今字。在“射不主皮”中,“主”是古字,我们在诠释中用了“注”字,“注”就是今字。对“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的“主”我们用“住”来诠释,“住”就是今字。“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中的“官”我们用“馆”来诠释,这里“官”是古字,“馆”是今字。

简言之,古今字就是古时原来本没有某个字,后来在某个字基础上造了今天使用的字,后造出来替代原有字的职责的字叫今字。

什么是通假字呢?说白了,大致古代“错别字”的意思。古人也有提笔忘字的时候和写字马虎的时候,忘了就找一个音同、音近、形似的字代替,这就是“通假”。由于权威者这么用,后来明明会写正确的字,有人也刻意仿效用它字代替。读《史记》,就会发现许多通假字,太史公应该是通假字的肇始人之一。假是“借”的意思,“借”具有“暂时”的属性,需要还给人家。先秦时通假字的现象不是那么普遍,释读先秦文字多见“古今字”,少见“通假字”。

“古今字”与“通假字”不是一回事,主要区别在于:

原本无其字,造字分其职——古今字;

原本有其字,借字来代替——通假字。

说法上也有区别,“古今字”用“同”表示,通假字用“通”表示。另外,千万不要轻易说“通假”,比如“少”字本来就有“稍稍”、“稍微”的意思,不要硬说“少”通“稍”。



五、本书的编排体例

下面对编排体例说明作以说明。

(一)关于[导语]

每篇篇首有一条导语,主要介绍全篇的主要内容、重要的思想以及著名的文句。指导学习者查找。

(二)关于[原文]

为了方便查找,我在每章《论语》原文前均标有篇与章的序数,并在奇页左端标示原文所在的篇目。

(三)关于[原文通释]

在原文下面附上了我对该章《论语》的整体解释。在“通释”中,我力求按规范的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对原文进行诠释:忠实原文,使原文的每个字都有着落,并且尽量不添加多余的文字;个别情况考虑语言疏通,增加了原文没有的字,比如对话语言中的“曰”,都明确地标出说话的对象,缺少主语或宾语的语言中补上了主语或宾语,个别的语言中增加了关联词、副词和时间词等。

(四)关于[注释]

“注释”的内容与通释的内容基本一致,个别有小的调整。“注释”力图说明每个字的意义、用法,介绍人物、事件及语言背景。为了方便独立学习单章《论语》,对个别文字不厌其烦地进行注释,比如“之”、“而”、“于”、“焉”、“诸”等。特别是前面几篇的注释要比后面详尽。注释中涉及了不少历史事件,文化常识和古汉语知识,对古汉语知识“抠”得比较细。对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文字多有注释,对可以多种解释的内容也基本予以注明。对生僻字、古今异读字、多音字都标注了拼音。解释某个生僻字时,先标示“音~”,再解释原文;在解释中出现的生僻字直接用括号标注了拼音,按《汉语拼音方案》对地名、人的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使用了大写,并按拼音连读的规则标音。

(五)关于[解读与点评]

这个内容比较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该章《论语》相关内容的补充介绍,学者们对该章《论语》的不同理解,我对该章《论语》通释角度的说明,学者们的争议。这个内容既与[注释]相关联,又有细微区别,个别其他的解释,我不予认同,也没有引入。但在[解读与点评]中介绍了并说明我采取的解释方法的理由。二是引述了前人对论语的注疏,主要是朱熹《四书集注》和(魏)何晏集解、(宋)邢疏的《论语注疏》。三是进一步通俗解释原文。[原文通释]为了尊重原文,个别语言不够通俗,在[解读与点评]中就有了变化。四是对个别章节的语言特色的分析。五是对该章论语的进一步诠释、背景的进一步说明。六是从学习该章《论语》的现实意义方面进行了点评。七是用史料和现实事例印证孔子的观点,并谈了我的一些认识。八是标明该章《论语》中出现的成语,这个内容可能不全,实际应用中被使用的成语可能要比我所列举的还多。

在[解读与点评]中,对生僻字、异读字也直接用括号标注了拼音,对个别难于理解的文字直接用括号进行了注释,并对所注释的字句加了着重号。对引用的大段难以理解的史料,也在引文后用括号进行了通释。在[解读与点评]中对相关《论语》内容的引述都标明了出处。直接在引文后用括号和书名号标出该引文所在的篇章。